

浙江新型城镇化的“低田”范本

探索中国基层“村企合一”的发展之路

■ 特约记者 方令航 金华报道

在中国大江南北，几乎所有的名村都有一名强人书记，今年48岁的余建胜被无可争议地看做把低田村带到今天的“能人”。20年前，做过代课教师，当过乡企出纳的他承包当时的金华县泡沫塑料厂，与所有江浙地区的草根创业者一样，余建胜带着干粮、铺盖外出打拼找销路，得益于江浙地区率先开放的民营经济大潮，余建胜收获了人生的第一桶金。2000年余建胜加上父辈办厂多年的积累，投资70万元购买12台塑料机创办三金泡沫厂，产品辐射金华、义乌、永康等地，当年就实现产值150万元。2002年，办厂有方的余建胜被推选成为低田村村长。此后，余建胜集厂长、村官双重身份于一身，以失地后的05平方公里低田村为载体，实施旧村改造，经营村庄资源。

低田村处于浙江金华-义乌的主轴线上，自古就是连接四省七县的古码头，民间商贸资源丰富，村民务实诚信。十年前低田村响应政府号召土地集中流转，迈开了城市化的第一步，失地后的低田村民不等不靠，余建胜带领大伙依托地理位置优势，发展第三产业，开拓市场资源，村民安居乐业，走出了一条企合一的城镇化探索之路。

金义都市区 大版图下的低田定位

低田历史上曾经是镇政府所在地，现在的低田周边有6万人口，低田村经济总收入200多万元，包括市场收入、物业收入等，发展服务业成为低田最好的拓展方向。低田村村民们的身份其实早已不是农民，村里现有253户家庭577人，但外来人口有1700人。多年来余建胜深深感受到，低田已经不是纯粹本地人的低田，今天的低田已经融入城市化的浪潮，每天有人离开，每天也有人加入。所以对低田的未来余建胜也有了更多更深的思考：低田的城镇化不能只是满足本地人的需求，而应该站在金义都市区的大版图下，借力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东风，让农民在集体土地上造社区，让农民在旧村改造中实现从造房、造厂到造城的进步。

“2013年金华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4700元，而低田村民早已超越了这个标准。低田村是金东区的东大门，一路之隔就是义乌地界，但我们的村民一点不羡慕富甲一方的义乌人：村民人人有稳定收入、社会保障不低于城市，孩子入学有交通费，考上大学、老人去世都有专项补贴。目前村民有店面223间，平均年租金收入15万元，更有60多人经商办厂，年收入都在百万以上。失地后政府提供了农民的五险一金，但只有城镇化成功了，产业升级了，转工问题解决了，后顾之忧解决了，农民问题才能真正解决。”低田村村主任胡新荣认为，低田的村民不能满足于当房东做老板，还要变股东，租房收益、财产收益、股权收益全要有，才能完成安居乐业到富而思进的升级。

金义都市区的崛起，对低田城镇化、卫星村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。低田现存村域面积500多亩，未来将被划分为几个板块：一条和谐路将村庄南北分开；和谐路以北，11层的社区大楼正在浇筑地基，大楼向西的原菜场地段，将建设一幢16层的



● 投资40万元新建的网球场前，低田村村委会书记余建胜（左一）和班子成员开始描绘下一张开发蓝图。

浙中城市群作为浙江三大主体城市群之一，是金华参与全球竞争、率先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地区。沿着金义东快速通道一路向西，来到孝顺镇地段，义乌江最美的一段江堤北岸，就会见到一座热闹超过某些县城的“乡村”，这里商贸繁华、交通繁忙，金东到浦江的县道穿村而过，在村里的这一段被称为和谐路——短短一公里的街面两边集聚了200多家商店，这就是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孝顺镇低田村。

都逐步进入城市规划区，但多数村庄还没有列入政府开发计划，而余建胜已经按城市的标准建设规划。这些年来，低田村相继修复了寺庙、教堂、公园、广场，村容村貌不断改善。今年以来随着新菜场、乐福超市的开业，商贸经营格局进一步完善提升，伴随大型电子显示屏、都市区首家村民网球场的竣工交付，低田正整合各方资源进行村庄优化：统一店面招牌，路灯亮化，还联合金华成泰合作银行，在全村商户中发放低田家园卡，引导村民走金融理财之路，这些工作没有花政府一分钱。

2006年余建胜就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，2年的求学经历以及67名企业高管同学资源，让余建胜的眼界更加开阔，学习期间他还担任“浙商置业”监事会主席，这些经历和浙大同学会资源让余建胜开始探索，用企业的思路经营村庄，“核心竞争力、接轨城市化、网络经济”等新词，一次次跳跃在他的脑海里。在经营村庄中，余建胜坚定一个信念：无论是物业租金还是“开发利润”都归村集体所有，“地是农民的”，村两委只起孵化作用，负责拆迁经营、建设，带动村庄发展。在步入城市化轨道的第一个五年，根据金义都市区新的城市发展定位，低田村的产业也要升级：要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发展服务业，发挥低田对工业区员工、东部村民的辐射效应，承接金义都市区、义乌两地的消费、居住需求，配套建设电子商务基地，联合“浙商网盟”扩展培训产业，突出抓好农民技能培训，提升农民再就业能力，把低田建设为金义都市区高标准的居住新板块。

余建胜集村、企权力于一身，在低田的方寸之地是当仁不让的“一把手”。余建胜陪着记者在村里实地察看，有村民主动递来了冰矿泉水，对他的尊重和信任由此可见一番。余建胜告诉记者，泡沫厂每年产值有1400万，现在基本交给妻子经营，自己就想着和村民一起把村庄建设好：“车子、房子早就有了，作为一名党员，利用现有的平台为村民做些事情，不是图个好名声，也是一份责任。我想让富裕起来的村民找到投资出口，而不是留给未来一个城中村。”余建胜自信所做的一切都是有前瞻性的、超前性的，“你们可以5年后再来看，低田是什么样子的”。多年来余建

十年改造积累经验奠定基础

20多年前，低田还保持着传统浙中乡村风貌，村民仍以耕作为生。2004年，低田启动第一次旧村改造，村干部为鼓励村民集资盖房说破了嘴、磨破了鞋，还是有人最终放弃。到了2011年因为有上次参与村民的获益效应，旧村改造22户指标就供不应求了，村里不得不采取增收择位费的办法以作平衡。低田村尝试吸收村民资金进行旧村改造集中建设，村里统一规划建筑，村民按拆迁面积成本价认购，超出面积适当提价补贴总体投入，村民都放心地把自己的旧房子交给村里开发和经营。2005年，村里投资260万建成低田办公大楼，2012年建设低田综合大楼，项目启动时村集体只有200多万元资金，因为不能抵押贷款，有人怕烂尾投了反对票，但村两委意见高度统一，余建胜甚至提出用自己的泡沫厂做担保，最终项目顺利建成，今年1月超市、菜场顺利开业，7月拆迁户们就可以搬进新居。

随着浙中城市群、金义都市区的推进，以孝顺镇为核心的金三角及周边乡镇

普遍关注的是地方债“自发自还”逐步放开的步伐是否会加快？

“未来中国地方债券市场的发展将取决于两个因素：经济增长及财政稳定性。”梁青强调，必须注意避免地方债务不受控制的突飞式增长，因此，在扩充市场规模之前，必须减少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依赖。同时，提高地方发债的透明度，也有利于投资者对其建立信心。

与中国债券市场的现状，梁青表示，“与亚洲其他市场一样，中国在岸债券市场也经历着快速的发展。根据标普中国债券指数，自2006年12月29日首次计算市值，中国债券市场的市值已翻一番，达到230亿元人民币。而衡量省级及市级债券的标普中国地方债券指数，则显示中国地方债券市场自2011年以来已实现5倍增长。”

标普中国公司债券指数显示，近年来公司债较政府债的比重有所增加，达到在

地方自行发债，摆脱还是加固土地财政

■ 特约撰稿 郭文婧

5月21日，中国财政部发布了《2014年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试点办法》的通知，明确2014年上海、浙江、广东、深圳、江苏、山东、北京、江西、宁夏、青岛试点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。由于我国预算法明确规定地方政府不允许发债，此次允许试点地区自行发债，一方面昭显对地方政府发债政策面的突破，另一方面亦不失为预算法修订前的权宜之计。

地方政府自主发债，世界很多国家都是惯例，甚至被视为地方政府的一项财权，或地方自治范围内的一项基本权利。地方政府自主发债的好处显而易见，可以促进地方政府的透明度，特别是财政预算的公开，可以丰富资本市场，更好地“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”。然而，人们对地方政府自主发债最大的担忧，还是风险控制问题，必须解决靠什么来还债的问题。正因为如此，我国目前还是试点的自行发债，而不是自主发债。

政府的债，只能靠政府的收入来还。而目前，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最大问题，就是土地财政依赖。一方面，由于过去我国地方政府不能自行发债，政府的融资平台的债务不得不以土地来担保，造成土地财政依赖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；另一方面，在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的问题没有解决之前，开闸自行发债，究竟会是帮助地方政府摆脱土地财政依赖，还是会进一步加剧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依赖呢？

我们必须正视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的两个重要背景。其一，目前我国很多地方政府是借台高筑，而且多承诺以土地收入来偿还。2013年6月，审计署公布的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，高达17.9万亿元，比两年前增加了7.2万亿，增幅达67%，扩张速度惊人。更重要的是，目前已经进入集中偿还款期。而近期，受到房地产市场波动的影响，地价水平有所回落，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受到较大影响，导致资金压力不断升级。地方债的开闸，无疑是解决地方债务危机的“一方良药”，最直接的好处就是有助缓冲地方融资平台的资金压力。

其二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结构失衡的问题由来已久，而且目前还没有看到好转的迹象。2013年，全国土地出让收入，再度超过3万亿元，并创下历史新高。土地出让收入占本级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，平均在5成左右，有的甚至高达7成。也就是说，地方财政失衡的问题，在短期内恐怕难以扭转，而目前地方实体经济增长乏力，更增加了终结土地财政依赖的难度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开闸地方债，地方政府究竟拿什么来还债呢？路径依赖之下，地方债缓解了地方政府已有的债务压力，土地出让收入会否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偿还债务的“救命稻草”呢？如果如此，地方债只会更加绑架土地财政。

从理论上说，地方政府自行发债，是让政府的举债行为真正置于了资本市场的监督之下，能否得到公众的购买，将由市场说了算。但考虑到我国公众投资理财心态的不成熟，特别是我国“大政府、小市场”还没根本改观的情况下，公众就会继续高估“被政府操控的市场”的价值；尤其是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成熟，政府透明度不高、市场化评级机构不发达，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能否倒逼地方政府着眼长远、提高资金运营效率、摆脱土地财政依赖，恐怕还是个未知数。实际上，加剧地方债膨胀和风险的可能，依然是不能排除的。

地方自行发债，能否成为一剂良药，能否帮助地方政府摆脱土地财政的依赖，实际上取决于两个方面。一个方面，当然是取决于地方债的用途本身，如果继续“唯GDP”追求城市建设“大跃进”的短期行为、形象工程、政绩工程，地方自行发债就可能进一步加剧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依赖；如果地方债着眼于扶持地方实体经济的发展，则可能起到帮助改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结构失衡的问题。然而，扶持地方实体经济的发展，可能不是立即见效的，而目前试点的地方自行发债，还只是3年期和5年期的短期债券，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。

另一方面，地方土地财政依赖问题的产生和加剧，与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，以及地方税缺乏主体税种、税收渠道狭窄，地方政府长期面对资金缺口，有很大关系。因此，解决地方土地财政依赖问题的根本举措，还在于进一步完善目前的分税制财税体制，明确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府间事权与财权，并真正建立稳定的地方税体系，增加地方政府财力。这方面，虽然国家已经开始努力了，但还有很远的路要走。如果如此，地方自行发债，就不仅为构建地方政府财力保障机制的改革赢得了时间和空间，也将进一步促进地方政府摆脱土地财政依赖。

按照逻辑，在允许地方自行发债之后，就应是允许地方自主发债了。开好“前门”，管好“后门”，处理存量债务、修改《预算法》、为地方政府自主发债专门立法、建立充分的信息披露制度、完善的地方债务风险预警机制、构建政府负债问责制度等等，都是应有之义。但如何真正解决好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依赖问题，才是地方政府发债能否健康走好的关键因素。所有的改革都是先从打破路径依赖开始，但打破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的路径究竟在哪里？至少，地方自行发债本身不是。

甘肃等五省首发516亿元地方债

2011年来已增5倍

徐科 报道

近期，地方债发行频现新动作：首先是呼吁多时的地方债自发自还试点工作启动。与此同时，甘肃、新疆、福建、广西、四川五省区将率先发行今年首期地方债，总额为516亿元，均将在6月13日招标。第二期183亿元地方债将于6月20日招标。此外，自发自还地方债信用评级指导意见也已出台，至此相关试点省市发行债券的节奏将进一步加快。

标普道琼斯指数固定收益指数副董事梁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，地方债自发自还的新举措是政府努力应对地方债风险的明证。由于地方政府将获许向债券持有人还本付息，市场预期此类债券将根据其各自的信用风险特点进行定价，而非像过往一样由中央政府信誉担保。这对中国经济债券市场发展与国际接轨将具有重要意义。

与股票不同，发行债券的核心在于到期偿还本金与利息。地方债“自发自还”由以往的中央隐性担保转变为各地自身信用的显性担保，违约风险问题引人关注。对此，梁青预测，从长期来讲，中国的债券市场将有能力对风险作出更恰如其分的定价，有利于其可持续发展。梁青强调，监管部门实施了一系列措施限制地方政府贷款过度膨胀，政策需要实施一段时间才能实现结构性的变化。

目前“自发自还”试点有十省市，市场

岸债券市场总值的35%。梁青表示，这反映了债券市场的整体发展，及流动性收紧的现状。

